

“资源诅咒”命题与中国在非直接投资对非洲的影响

刘青海

(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近 10 余年来,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增长势头令人瞩目。与此同时,西方对中国在非投资的非议也甚嚣尘上,他们以“资源诅咒”命题为理论根据,宣扬中国在非投资活动是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对中国在非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特征和“资源诅咒”命题的科学性进行了考察,认为“资源诅咒”命题本身存在很多缺陷,并不足以作为分析评价中国在非投资活动的理论基础,探究了西方把“资源诅咒”命题作为理论根据的根源和中国在非投资对非洲的真实影响,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非洲;资源诅咒;中国直接投资;影响
中图分类号: F119.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363(2012)03-0172-05

近 10 余年来,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增长势头令人瞩目:2003—2008 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从 0.75 亿美元增加到 54.9 亿美元,增加了 73 倍,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从 2% 上升到近 10%;2009 年,在全球跨国投资锐减的情况下,中国对非直接投资逆势上扬,仍达 14.4 亿美元,投资国别覆盖率达 81.4%,2010 年更达 85%(仅次于亚洲)^[1]。非洲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大目的地。与此同时,西方对中国在非投资的非议也喧嚣尘上,他们以“资源诅咒”命题(natural resource curse,NRC)为理论根据,认为中国在非投资降低了非洲的经济增长率,宣扬中国在非投资活动是所谓的“新殖民主义”。这种看法是否科学?其原因是什么?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究竟对非洲造成了什么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一是需要对中国在非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及特征进行了解,二是需要对 NRC 的科学性及原因进行审视。

1 中国在非直接投资的行业及特征

不同的产业,对东道国的影响也会不同。西方学者对中国在非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进行了研究,发现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在中国对非投资中居于主导地位,例如,克格达(Kiggunda)发现自然资源投资占中国全部对非投资额的 40%,而商业、制造业分别只占 33% 和 4%^[2]。相比之下,由于数据难以获得等原因,中国国内的相关研究还比较缺乏。幸运的是,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 3 家单位于 2010 年 3 月共同发表了《200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下称公报),对中国在非直接投资有了一个相对权

威的和较新的统计。然而,公报对中国在非洲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情况并没有直接的数据,所幸的是有相关的国别数据。由于非洲大部分国家工业化水平较低,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因此,国别分布的情况大致可以代表行业分布的情况。从 2009 年年末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存量来看,居于前 10 位的依次是南非(铬铁矿、金、铅、铁、铜、锰、金刚石)、尼日利亚(石油)、赞比亚(铜)、阿尔及利亚(石油)、苏丹(石油、铁、铬)、刚果(金)(铜、金刚石)、埃及(石油、天然气、磷酸盐)、埃塞俄比亚(金)、坦桑尼亚(天然气、金)、毛里求斯(表 1)^[3]。可以发现,这些国家除毛里求斯以外,都是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

表 1 2009 年末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情况表 万美元

Tab. 1 Direct investment stock of China to Africa by the end of 2009 10 ⁴ U. S. dollar					
国家	排名	存量	国家	排名	存量
南非	1	230 686	刚果(金)	6	39 743
尼日利亚	2	102 596	埃及	7	28 507
赞比亚	3	84 397	埃塞俄比亚	8	28 344
阿尔及利亚	4	75 126	坦桑尼亚	9	28 179
苏丹	5	56 389	毛里求斯	10	24 284

表 2 2009 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情况表 万美元

Tab. 2 Direct investment flow of China to Africa in 2009 10 ⁴ U. S. dollar					
国家	排名	流量	国家	排名	流量
阿尔及利亚	1	22 876	埃塞俄比亚	6	7 429
刚果(金)	2	22 176	加纳	7	4 935
尼日利亚	3	17 186	马达加斯加	8	4 256
埃及	4	13 386	南非	9	4 159
赞比亚	5	11 180	尼日尔	10	3 987

从 2009 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流量来看(表 2),居于前 10 位也都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其中,对阿尔及利亚、刚果(金)、尼日利亚、埃及、赞比亚五国的直接投资

收稿日期:2011-06-20;修回日期:2012-04-08
基金项目:教育部 2009 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9JZD0039);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11YD06Z);浙江师范大学校级课题(SKYB201005)
作者简介:刘青海(1974—),女,湖南邵东县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非洲经济研究,(E-mail)liuqinghai@zjnu.cn。

流量均达1亿美元以上,可见,中国在非直接投资大部分分布于资源性行业。因此,中国投资对非洲的影响,相当一部分是针对石油、矿产生产国而言的,只是由于国家的大小不一,小国(如塞拉利昂、利比亚等)可能更能感受到中国投资的影响。不过,这并非是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独有特征。实际上,50%~80%在非的外国企业都是自然资源开采型企业,分布于安哥拉、乍得、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和南非等资源丰富的国家^[4],显然,这只不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对于资源价格的快速上涨(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所导致的一种自然的反应而已,在这方面,中国最多只能说是一个后来者和追赶者。

中国资源投资项目的突出特征是其常常与发展援助项目(如给东道国政府的优惠贷款)捆绑在一起(即所谓的“安哥拉模式”)。该投资项目由一组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易货协定组成,包括两个部分:中国政府通过进出口银行给予非洲政府的优惠贷款(这笔贷款以取得矿藏的开采权来作为担保)和中国企业与非洲政府的合同(规定贷款用于中国企业在东道国修建公路、铁路或建立矿产企业的费用)^[5]。以中国与安哥拉的石油开采权项目为例,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中国进出口银行承诺给安哥拉政府贷款20亿美元。

除了资源行业以外,中国在非企业也较多地从事基础设施行业,中国路桥公司、中国铁路建设公司、中国工程集团、中国三峡公司等都在非洲修建或修复了不少公路、铁路、水坝、体育馆、办公大楼等。与资源产业不同的是,这却是西方企业几十年来都不愿意涉足的行业,这里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基础设施项目常常与资源项目捆绑在一起,这也是“安哥拉模式”的内容之一。例如,中国在加蓬建造了310km的连接矿产地与港口的铁路线、1座水电大坝、1个深水港(在利伯维尔以北),而这些项目是与1个价值30亿美元的开采铁矿石的合同捆绑在一起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曾被英国BP公司拒绝,因为它觉得这过于昂贵,代价太大了^[6]。此外,中国在其他行业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如农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零售业等,呈现日益多样化的趋势。

由上可见,中国在非直接投资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分布于资源性行业。从这一点而言,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与事实并无大的偏差。问题是,这个事实是否必然导致降低非洲经济增长率的结果呢?西方学者得出这个结论是以NRC为理论基础的,那么,这个理论基础可靠吗?

2 非洲研究中的“资源诅咒”命题

2.1 “资源诅咒”的定义问题

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还没有一个NRC的正式定义。不同的作者在使用这个术语时依不同的内容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在非洲研究中更是如此。一般以为,它是指

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经济发展慢的一种现象,其原因可以归结为“荷兰病”、寻租行为等。

“荷兰病”是指一国特别是指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的衰落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了大量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天然气业的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货币升值,这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其他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这种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价格膨胀是以牺牲其他行业为代价的现象,国际上称之为“荷兰病”。寻租是指通过一些非生产性的行为对利益的寻求,如政府部门通过设置一些收费项目来为本部门谋求好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为个人赚取利益等。寻租往往使政府的决策或运作受利益集团或个人的摆布,往往成为腐败和社会动乱之源。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由于政府可以依靠对自然资源的控制而获取收入,维持政府的运转,因而丧失了生产的动力,并由此衍生了政府腐败、制度缺失、社会不稳定等现象,因而降低了国家的经济增长率。

2.2 “资源诅咒”命题:一个理论基础吗?

一些学者认为人们已经就“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不如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增长得快这一现象”达成了共识^[7]。这种所谓的NRC“共识”给予了它在社会科学中典型理论的特征,于是,不少研究把NRC直接作为分析非洲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理论基础。诚如以上所言,由于自然资源容易导致“荷兰病”和寻租行为,NRC也有它的合理之处。然而,从NRC的一些根据来看,还存在不少令人怀疑的地方。

首先,自然资源诅咒命题在语义上是具有争议的。“诅咒”一词意味着受到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伤害,让人一看到自然资源就联系到贫穷。然而,在社会建构环境中,没有什么现象是自动的和无可避免的,NRC也不会例外。

其次,资源投资引起的贸易条件恶化效应还有待进一步商讨,不少学者如丹雷蒂(Darity)、布洛克(Bloch)、费兰提(De Ferranti)等都对这个效应提出了怀疑,他们在一些相关性分析中,并没有看到这种贸易效应,而这是NRC的一个主要根据之一。

第三,推出NRC所采用的计量分析方法的准确性是令人怀疑的。萨克斯(Sachs)、沃勒(Warner)是NRC的主要代表,然而,他们主要使用资源依赖的测度方法(如贸易密集度),但这种方法难以避免内生性问题,特别是在政策影响汇率或其他贸易部门的增长效果时。并且,他们也没有给出一个区分资源丰富和资源依赖国家的明确的指标。这样,他们的结论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到底拥有多少资源就可以算作资源太多了呢?此外,萨克斯、沃勒根据发展中国家样本所观察到的增长率放慢的现象在时间上并不连续,这种对一段相当长时期对增长率(回归的内生变量)进行平均计算的回归的稳定性是令人怀疑的。

第四,许多资源丰富国家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增长率实际上是很高的,只是在 80 年代才开始放慢。但是,80 年代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比较缓慢而并非是资源丰富国家的独有现象。这说明,许多看起来是由资源开采引起的增长率放慢问题,也可能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

最后,在实践上,NRC 不仅不能适用于所有自然资源丰富国家,就连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SA)都不能全部适用。从世界发展的历史来看,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取得了不错的经济增长成绩。即便是在 SSA 国家,NRC 的适应性也遇到了问题,博茨瓦纳就是一个例子。众所周知,博茨瓦纳是 SSA 著名的宝石生产国,在世界 161 个矿产资源出口国中,名列第 18 位,其宝石、镍、铜等矿产资源丰富。然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的 30 多年中,博茨瓦纳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 7.8%,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说明,丰富的资源不一定会阻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即便是对于非洲也是如此。

综上可知,在自然资源与经济的低增长率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资源本身是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或正向的作用的。显然,NRC 不是公理,甚至也不是一种理论,它只不过是部分国家存在的一种现象或一个观察到的特征,最多只能作为一种共识而已,是不能作为分析国际问题的理论基础的。

尽管如此,西方很多研究在分析非洲问题特别是在考察中国在非直接投资对非洲的影响的时候,仅从中国投资不少分布于资源行业出发,无视其具体的情况和特征,便以 NRC 为理论基础,认为中国在非投资不利于非洲的经济增长,进而得出了中国在非投资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结论,显然有失公允也不符合学术规范,这种描述和 NRC 一起,无疑是把中国置于“西方和非洲的敌人”的地位并影响彼此未来的关系。

2.3 非洲研究中“资源诅咒”范式原因

NRC 命题来源于经济,但已经扩散到国际关系中。在国际关系中,NRC 是一个松散的概念,常常与不同的名称(如荷兰病、寻租国家或石油政治第一定律)联系在一起,尽管它并没有具备作为一种理论应该具有的特征,然而,它却依然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大行其道,并几乎成为非洲研究中的一种范式,这里面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

第一,冷战期间,非洲被视为是两极世界的外围,被当时的国际关系理论边缘化^[8],造成非洲研究理论的缺乏。冷战结束之后,这种理论的缺乏状况似乎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这就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一个挑战,而 NRC 似乎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这也是冷战后 NRC 命题受到非洲研究学者追捧的部分原因。

第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难以独立于他所处的环境。相对于其他学科,国际关系的研究者更加依靠政府

提供的资源,政府必然以自己的价值取向为标准,对研究者施加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者因而难以独立于他所处的环境。而且,研究者还可能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试图用他的研究来影响环境。这就是说,创立一种不包含价值取向的国际关系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我国走的是和平发展之路,不会像历史上西方国家通过侵占殖民地或不平等贸易的方式掠夺资源能源,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仍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警惕和防范,而 NRC 则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

第三,“道德风险”的存在。由于国际关系的每一种理论都具有自己的类别、假设、分析和评价的标准,对于一种理论为什么优于另一种理论并没有一种逻辑一致的解释,这意味着在比较研究的时候缺少比较的基点,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理论中,采用不同方法的研究者的结论是不可比较的,甚至可能造成不同的社会研究者的对话毫无意义。如果研究者发现没有人可以处以批评他的位置,就会存在一个巨大的“道德风险”,可能导致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不去讲求精确和严谨就得出结论,把 NRC 命题当成理论正是如此。

第四,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由于国际关系界几乎没有预测到 1945 年后的诸多重大事件(如苏联的解体),造成国际关系已有理论与实践差距加大,其科学性日益受到质疑,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 NRC 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命题,一方面迎合了西方和非洲一些反华势力的需要,一方面又确实能够解释一些实践的现象(特别是非洲地区),再加之中国在非洲研究上缺乏话语权,因此易于被西方学者接受。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毋庸讳言,资源型产业通常是飞地型产业,与东道国其他经济部门的前向与后向联系都很少,加之,其生产模式大多是垂直一体化的,其投入主要来自于自己的分销渠道或从海外获取,因而对当地经济的正向影响从这一层面来讲确实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中国在非企业的投资毕竟给东道国带来了巨额的矿产收入,使其潜在的资源价值得以实现,如果东道国政府的制度体系和政策比较完善,对巨额矿产收入的管理得当、运用合理,其资源行业依然可以充当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博茨瓦纳就是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而且,由于中国资源投资的突出特征(常常与优惠贷款和基础设施建设绑定在一起),这对于弥补东道国资本的缺乏、完善投资环境、推动经济的增长是有巨大贡献的。从国际技术溢出的角度来讲,由于国际技术溢出存在地域效果(即技术溢出会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少),但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弱化这种效果,因此,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缩小非洲

与世界技术水平的差距,增加国际技术的溢出进而增加非洲国家的发展潜力,也是具有积极作用的^[9]。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中国直接投资遍及非洲40多个国家,其地理分布并不均衡,因此其对非洲国家的影响也各异,这既取决于中国企业的行业、特征与数量,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洲国家本身的大小、制度、政策与对中国企业的反应。毕竟,“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因此,非洲国家的做法如何,将会在促使中国企业的影响向正面发展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还必须补充的是,中国投资的影响如何,并非是预设的或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变化的形势而加以调整。最后,由于中国的投资常常与援助、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结合在一起并互相影响,互相加强,因此,只有把这些活动进行综合的考虑和系统的研究之后才能发现中国投资对于非洲发展的真正影响。

在社会建构环境中,没有一种现象是自动的和难以避免的,NRC也不例外。资源本身是不能破坏一个国家的经济或造成政治不稳定的,怎样去看待它们是很关键的。如果把NRC看成是一种理论的话,则可能夸大自然资源在非洲政治经济中的负面地位,并形成对非洲事务研究特殊的思维方式。例如,在加纳发现石油以后,很多学者都下意识地预测这个非洲管理得最好和最稳定的国家之一,将会陷入“黑色金子的诅咒”^[10]。

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潜在的危险,NRC可能转化为一种教条,这在中国在非投资对非洲影响的争论中可能会产生潜在的误导作用。中国在非洲资源丰富国家的投资活动被视为是对当地社会的一种威胁,甚至被称为“新殖民主义”^[11]。这种论调虽然站不住脚,但很明显,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伤害了非洲国家吸引我国投资的热情。西方一些国家散布新的“中国威胁论”,制造出我国具有控制非洲资源能源的舆论氛围,将我国在非投资这样一种互利共赢的经济现象泛政治化,企图达到遏制我国对非资源投资的目的。

3.2 建议

第一,督促中国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严格遵守东道国关于劳工保护、税收、环保等方面的法律,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尽最大可能实施企业本地化,将促进自身发展和东道国经济社会进步紧密结合;第二,加强与当地社会沟通交流。在境外投资的运作中,除应高度重视与各国政府部门以及同业间的沟通外,还要善于与当地工会、媒体、社区、非政府组织打交道,在不损害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增强企业的透明度,促进当地社会对企业的了解,化解东道国政

府和民众对中国投资的敏感反应;第三,组织推出对非成功案例系列宣传,不仅宣扬我方获得了什么,而且宣传企业特定投资项目对东道国财税收入、环境、公用基础设施、就业、民生、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诸多贡献;第四,增加对非洲文化、语言、经济的研究,注重中国对非投资的技术转移和技术转让,促进中非投资合作的结构提升和产业多样化;第五,由于中国在非投资过于集中于资源产业的问题与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当务之急,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变粗放型增长模式为内涵型增长模式,进一步完善市场体制。

参考文献:

- [1] 柯珊珊. 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劳资纠纷问题研究[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6(4): 27-29.
- [2] Kinggundu N, Moses A. Profile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Africa[J]. Proceedings of ASBBS, 2007, 15(1): 23-31.
- [3] Goldstein N, Pinaud H, Reisen, Chen X.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What's in It for Africa? [C]//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 2006.
- [4] Corkin L. Uneasy Allies of Necessity: China's Evolving Relations with Angol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China's Quest for African Resources: The New Scramble or Strategic Partnership" [R]. Polish: University of Wroclaw, 2009: 14-15.
- [5] Kaplinsky R, Morris M. Chinese FDI in Sub-Saharan Africa: Engaging with Large Dragons[J].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009, 21(4): 551-569.
- [6] Gu J.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in Afric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African Development[J].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009, 21(4): 570-587.
- [7] Iimi A. Escaping from the Resource Curse: Evidence from Botswa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J].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7, 54(4): 45-52.
- [8] Dunn K. Introduction: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C]// Dunn K, Shaw T, Palgrave M. Africa's Challenge to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Ltd., 2001.
- [9] 刘青海, 刘鸿武. 中非技术合作的回顾与思考[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6(1): 1-5.
- [10] Friedman T. Ghana and Its Oil: Dangerously Hopeful [J]. The Economist, 2010(1): 33-42.
- [11] Brautigam D.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77-279.

“Natural Resources Curse” and the Effects of Chinese OFDI to Africa

Liu Qinghai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In the past decades, 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increases very quickly, at the same time, much negative opinions from west countries about it appears based on “natural resources curse”. The research first studies sectors, characters of 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then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natural resources curse”, and find out it can not act as a theory basis. In the conclusion,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and the danger of considering “natural resources curse” as a theory basis. In the end, some suggestions are given.

Key words: Africa; natural resource curse; 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effects